

监管新规三月实施 用户可选择关闭互联网算法推荐

本报记者 裴昱 北京报道

互联网平台企业依托大数据和算法蒙眼狂奔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与之相关的算法“黑盒状态”也将

企业合规自查

《规定》对算法的合规要求、监管和约束,会更介入于互联网平台的具体业务开展层面。

“我们有足够的准备,从之前《规定》开始征求意见,我们就做了很多对照自身业务开展的合规工作。”1月4日中午,一位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合规部门负责人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这几个月以来,合规部门和业务单元召开的会非常多,都是为了自查合规。”

这是很多互联网平台企业和机构的合规部门自2021年8月以来的工作状态。2021年8月,国家网信办就《规定》向社会征求意见,互联网平台企业和机构大部分已经同步在内部启动了合规自查的相关工作,因此,对于此次正式下发的《规定》,他们都表示,有充分的准备。

另外一家大型网络平台企业的合规部人士向记者表示,相比于反垄断、网络安全审查、数据安全等方面的监管,《规定》对算法的合规要求、监管和约束,会更介入于互联网平台的具体业务开展层面,因此,内部交流、协议,避免出现触碰“合规红线”就变得非常重要。

终结。在数据愈发成为现代社会生产要素的背景下,与数据有关的监管措施和体制的完善,显然更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公平与正义。

在历经四个多月面向社会公开征求

记者了解到,主要的互联网平台机构都正在进行一项工作,即对不良信息、违法信息进行类别层面的归类,继而形成、完善违法信息、不良信息的“特征库”。一位技术人员表示,这是算法合规工作的必须动作,如果这个技术基础不具备,那么,就无法真正实现算法运行的合规。

“算法推荐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实际上就是打标签,更具体一点说,就是给用户对信息的识别、阅读行为打标签,从而通过积累和大数据判定其对信息的喜好,而后根据这个判定,推送特定的内容,这也就是有的平台企业说的,‘千人千面’的来源。”他向记者解释。

在形成违法信息、不良信息的特征库后,根据监管部门的合规要求,算法在设计时,就不得对这些已经“入库”的违法信息、不良信息给用户打标签,从而就不会形成针对这一类信息的推送偏好,这是监管的核心要求之一。

《规定》第十条要求,算法推荐服

务提供者应当加强用户模型和用户标签管理,完善记入用户模型的兴趣点规则和用户标签管理规则,不得将违法和不良信息关键词记入用户兴趣点或者作为用户标签并用以推送信息。

“加强用户模型和用户标签管理,完善记入用户模型的兴趣点规则和用户标签管理规则;加强算法推荐服务版面页面生态管理,建立完善人工干预和用户自主选择机制,在重点环节积极呈现符合主流价值导向的信息。”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在随《规定》一并发布的“答记者问”中表示。

另外一位互联网平台公司的算法技术岗位人士向记者表示,在和合

价值观,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互联网信息服务健康有序发展。《规定》将在2022年3月1日起实施。



新规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本报资料室/图

规部门多次开会协同工作后,从他的角度看,《规定》的内容是非常专业的。“基本上抓住了算法运行的关键环节,对优化、完善算法是非常有效、有用的。”他对记者说。

“《规定》和很多上位法进行了有效衔接,是整个大体系中的有机一部分。”一位长期从事互联网企业合规外部服务机构的法律界人士告诉记者,与《规定》有关的上位法包括《个人信息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等。“除此之外,还包括了《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等制度性设计的顶层文件。”他说。

多地公布“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 弥补养老消费差距

本报记者 索寒雪 北京报道

近期,北京、四川、山东等地相继印发了省级的“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在2021年末也对外公布并已印发国

不同学历养老需求相差一倍

正处在人生财富峰值的“60后”一代,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养老规划,并对养老需求有着清醒的认识。

《报告》显示,随着受访者学历的提高,选择养老方式的预期月花费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博士学位预期养老花费15453元/月,为最高,初中及以下7155元/月,为最低,两者相差近一倍。

《报告》发现,被调研者对养老服务的需求是千差万别的。课题组负责人向记者表示,“政府针对大众养老增加了普惠性服务,而普惠性是针对大众人口的,那么大众人口里其实也还是有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之分,所以我们提出城市养老服务规划当中的不同定价模型,来解决大众人口普惠性产品的定价机制。”

家级的“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将养老服务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增加养老服务设施总量,应对人口老龄化。

日前,由清华大学银色经济与健

康财富发展指数课题组完成的《中国城市养老服务需求报告(2021)》(以下简称《报告》)显示,老年人对养老开销预估存在明显的城市和收入水平差异,高收入人群比普通收入人群平均花费预期高45%。

其中,“60后”人群的父母多已年迈需要被照顾,因为他们与父母有过实际接触,所以“60后”对养老所需费用的感知较为准确,再加上这个阶段的“60后”已经处于财富积累的峰值,不像“70后”和“80后”仍要承担房贷、教育子女等经济压力,对各种养老方式预算最高,其中机构养老(不含旅居和海外养老)花费10584元/月,旅居养老花费14705元/月。

每一类人群都将找到适合自己的养老方式。

前述人士表示,“我们党和政府非常关注养老服务,所以像敬老院这

样的体制我们已经运行了70多年,相对成熟,但它属于兜底服务。近年尤其2021年,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发文,又提出了普惠性服务,还为个性化高端服务留出了空间。这样一来,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私人产品三类产品俱全,标志着中国养老服务体系将走向一个完整系统的发展新阶段。”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养老服务设施总量缺口和结构矛盾突出。政府层面在普惠性养老服务方面,也将有所作为。

记者了解到,北京市发改委编制印发《北京市“十四五”时期社会公共服务规划》,将出台包括开辟老年人绿色通道、推动线上服务适老化改造等一系列举措,以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数字鸿沟”问题。

“大妈是决策者”

“从消费结构上看,我们现在衣食住行等基础消费搞定了,基本上没太大问题,现在的问题主要是解决高层消费。”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专家党俊武向记者表示。

面对不同的养老需求,消费者的支出呈现出很多倾向,比如很多中老年人还需要为子女支出。

党俊武认为,“实际上我们现在是准老龄经济,不是真正的老龄经济,中老年人很多钱是花给

子女了。典型意义的老龄经济是中老年人要为自己花钱,这才是老龄经济。”

“甚至更为具体的是,中老年人消费的关键主要是中老年妇女的消费,因为‘大妈是决策者’,所以老年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妇女经济。”党俊武表示。

《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0年末我国共有养老机构3.8万个,养老服务床位823.8万张。

北京市民政局定期公布的北京民政统计公报,分季度、年度对

北京市的养老机构的情况进行统计,统计的指标为机构数量、总床位数、类型、收养人数等。截止到2020年3月,北京市各类养老机构有560家,社区养老照料机构和设施898家,共1458家。

由于缺乏对养老服务机构性质、床位功能、医护机构托管养老社区实现医养结合的统计数据,因此各个机构无法根据国家统计数据分析我国养老服务事业和产业的发展状况,三大类服务的供给情况,特别是刚需服务的供给情况。

普惠服务获支持

“老龄经济、老龄产业的困境,主要原因就是供需双方的观念都有问题,需方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党俊武表示。

子女问题也影响着老年人的消费。“更重要的是,我们做产业的人,包括做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的,必须扩展视野,在这里面要看到更多的东西,幼儿园能不能消费看父母,将来老年人能不能消费看子女。”党俊武表示。

随着各省“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的公布,一些普惠性的养老

服务将成为“硬指标”。

近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以下简称《规划》),1月10日,国家发改委联合有关部门正式下发文件。

在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孟玮表示,这是“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一段时期我国促进公共服务发展的综合性、基础性、指导性文件。

《规划》首次将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高品质多样化生活服务纳入规划范围,将全面统筹幼

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优军服务保障、文体服务保障九个领域。

同时,《规划》提出要坚持财力可负担、服务可持续的底线要求,既强调政府必须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和标准,突出群众急需、政府重点支持的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又明确了政府责任边界,避免落入“福利陷阱”,促使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

港交所正式引入SPAC机制 打击壳股政策未见放松

本报记者 杜丽娟 北京报道

在各大机构披露2021年度A股市场主要数据后,受益于注册制改革的深入推进,A股IPO实现了常态化运行。根据Wind统计,2021年A股共有524只新股上市,同比增长19.9%。

然而,对比A股IPO数量和募资规模,港股2021年的表现却略弱一些。Wind数据显示,2021年港股IPO市场首发募资总额为3314.4亿港元,较2020年的4001.4亿元,下滑了17.16%。

“2021年港股IPO可谓是冰火两重天,上半年‘大肉签’频频出现,投资赚钱效应提升,进入下半年后,IPO上市首日破发潮接踵而至,这使市场的投资情绪不断下降。”对于港股整体表现,一位资本市场人士如此评价。

在该人士看来,尽管从2021年第三季度开始,港股IPO出现大规模的破发,但破发潮也使股价逐渐回归正常定价区间。

“长远看,作为中概股回归的首选市场,港股仍具有投资价值,同时随着中概股回归趋势增强和SPAC(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特殊目的收购公司)制度落地,预计2022年港股IPO市场将迎来新的增长点。”该人士说。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港股破发潮之后,市场关于SPAC上市机制的讨论也渐起。而从概念提及到正式引入,短短几个月时间,港交所就完成了对SPAC上市机制的重大推进。

2022年1月1日,香港交易所全资附属公司香港联交所引入新规则,设立全新SPAC上市机制,并决定自当日起生效。这成为继美

国、新加坡等资本市场后,又一个引入SPAC上市机制的资本市场。

简单说,SPAC就是一家空壳公司,其设立的唯一目的是通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进行集资,并以集资所得收购合并有经营活动的目标公司,从而达到合并后的继承公司成为上市公司的目的。

安永大中华区上市服务主管合伙人何兆烽在回应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规定,SPAC需要在限定时间内找到合适的目标公司并完成合并,合并后的公司会变为普通的上市公司,目前港交所规定的时间是36个月。

何兆烽解释,从找到目标公司到继承公司通过合并变为普通上市公司的过程为De-SPAC阶段。

“当上述过程顺利完成后,SPAC的生命周期也会同时结束,如果在36个月里,目标公司没有找

到或没有完成最后程序,那港交所就会将其除牌,之后SPAC会进行清算,此前集资所得的资金也会退还股东。”何兆烽告诉记者。

基于SPAC的特有属性,港交所规定SPAC证券投资仅限于专业投资者认购和买卖,这与美国的相关规定有些不同,目前美国在SPAC阶段没有对投资者身份设限。

“相比美国市场,香港市场的散户较多,由于港交所最近才正式引入SPAC机制,短期看,散户对这种新概念的理解和风险把控还需要一定时间的熟悉,为了保护广大散户投资者的权益,港交所限制散户参与SPAC证券买卖,目的也是降低SPAC对香港资本市场带来的风险。”上述资本市场人士表示。

在公开场合,香港交易所集团行政总裁欧冠升也表示,香港交易所增设SPAC上市机制,可进一步巩固

香港作为全球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我们希望,通过引进SPAC上市机制,允许经验丰富、信誉良好的SPAC发起人,物色新兴和创新产业公司作为并购目标,扶持一些富有潜力的企业新星茁壮成长。”欧冠升说。

在资本市场人士看来,随着中国内地及海外企业通过De-SPAC方式在美上市趋势持续,港交所希望通过引进SPAC制度吸引相关企业来港上市,但市场对SPAC机制与A股借壳上市路径也存在质疑。

“事实上,不管是投资者还是监管部门,对于借壳上市各方都比较谨慎,从目前发布的政策细节看,SPAC的引入主要是顺应市场需要,预计这一机制会暂时在港股实施。”安永审计服务合伙人李康介绍。

在他看来,未来监管也会将De-SPAC视为新上市申请,这是保障香港资本市场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

此前,港交所曾多次修订上市条例以打击造壳、壳壳等违规现象,并陆续推出一系列措施加强监管力度,包括对反收购条例和除牌机制的修订以及推出关于上市公司业务充足水平和大规模发行证券的指引,这些举措使借壳上市和壳股活动大受打击。

在上述资本市场人士看来,港交所实施这一系列措施后,目前对打击壳股已渐有成效,在这种背景下,港交所不会因为引入SPAC上市制度就轻易放弃监管成果。“防止企业通过不同方式规避相关上市规定,是港交所引入SPAC上市制度必须守住的防线。”该人士补充道。